

唐代教育体制研究

TANG DAI JIAO YU TI ZHI YAN JIU



唐代教育体制研究

宋大川 著

社 长 任兆文
总 编 辑 左执中
责任编辑 金 山
装帧设计 许 烈
内文设计 荷 屏

唐代教育体制研究

宋大川 著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03 千字

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5440-1385-5

1356 定价:14.50 元

前 言

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唐代教育体制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崇圣尊儒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健全和完善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为唐以后的封建王朝树立了稽式和楷模。

李渊父子建立了大一统的唐帝国后，在政治上面临着如何运用整体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方针的问题。贞观君臣对儒学的政治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极高的评价，把儒学视为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政治思想武器。然而，自汉代以后，儒学受到内外两方面的矛盾冲击而衰落，造成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思想大混乱、大动荡，使儒学的权威地位受到动摇，无法以统一的、整体的思想体系为大一统的唐帝国服务。

儒学的衰落表现在两个方面。就儒学自身而言，儒学教育的内部分歧，削弱了儒学的权威性：第一，派别之争。汉代儒学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两派内部又有着师法和家法之分。在西汉时期，两派斗争激烈，有过四次大的论争。第二，内容各异。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各以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去解释儒家经籍，而且，为了维护自己学说的尊严，各儒学大师又树立起森严的师法和家法，从而造成了儒学教育内容的混乱局面。第三，臧否政治。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士人品评政治、臧否人物，反映出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在这一历史时期存在着与封建王权相矛盾的地方。第四，南北分经。南朝经学受玄学影响较多，北朝经学多重章句。

在儒学内部，东汉时期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对儒学教育予以强烈的震撼。就儒学的外部环境而言，魏晋玄学的泛滥，对“名教”、封建等级制、六经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佛教的传播，在思想上也是对儒学教育的挑战。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儒学内部师法家法的传授、今文经古文经在争辩中的相互吸收以及玄学思想和佛学思想对儒学的影响和浸透，在客观上也为唐初融汇百家学说，统一儒学教育思想创造了思想条件和历史条件。

唐代统治者为维护 and 巩固封建政权，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使之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唐代统治者改造儒学、建立崇圣尊儒教育思想的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尊崇孔子，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从武德到开元，中央及地方学校皆立孔子庙，春秋释奠。同时，孔子的地位不断被抬高，达到帝王（文宣王）的尊荣。唐代统治者将孔子偶像化、神圣化，强烈地表现出施儒家之教、行儒家之政的政治目的，表明教育与政治的结合和为政治服务的作用。第二，统一教育内容，建立唐代新儒学。从贞观开始，唐代统治者就致力于儒学教育内容的统一，从颜师古到孔颖达，最后到长孙无忌，这一过程长达二十年。以《五经正义》为标志的唐代新儒学有几个特点：儒学为政治之本；立圣人之教的教学法则；强化礼制教育；融汇百家，儒学为宗。第三，中唐以后，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为代表，形成了“道统”教育思潮，提出教育以明道、文以载道、师严道尊的师道观，强化和发展了崇圣尊儒的教育思想。

崇圣尊儒教育思想是对汉晋南北朝以来儒家教育思想的一次大整理、大总结和大统一，结束了四百年以来儒家教育思想的大混乱、大动荡的局面，反映了唐朝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需要，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和意义。同时，崇圣尊儒的教育思想是唐代国家的教育思想，是真正在国家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居

主导和决定地位的教育思想，是对唐代教育体制的建立起决定作用的指导思想，它的作用和功能决非以往的研究中较偏重的那些个人的教育思想所能比拟。

唐代健全和完善了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而这一健全和完善是在崇圣尊儒教育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强烈地表现了教育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在政治上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建立的同时，唐代统治者在教育上建立了以礼部为中心的集权管理体制。无论是国子监各学校，还是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其学生入学和毕业都由礼部统一管理；州县学生升入四门学，亦需经由礼部的批准；礼部的祠部司管理职业教育（天文学、占卜学、兽医学等）。另一方面，礼部规定统一的科举考试内容，天下官私学生皆须修习统一的教材，从教育目标上、教育内容上、培养方式上将全国教育统一在集权化的教育体制中。第二，地方教育成为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地方教育虽亦有规模，但由于养士教育与取士制度的不协调，始终未能真正成为国家教育的组成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唐代统治者采用了州县学生升中央学校的补阙升级制和科举取士的方法，理顺了地方教育与中央教育的关系，将地方教育纳入了国家教育体制之中。第三，在官学的内部管理中，学礼制度的确立，强化了孔子和教师的地位，表现了崇圣尊儒的教育指导思想，树立了儒学的绝对权威。处罚制度的确立，保障了培养目标的顺利完成。入学制度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体现，等级化的入学标准将学校分为不同的等级，学生严格按照其政治等级身份入不同的学校学习，表现了教育的政治化。教育经费的国家财政化，使教育投资成为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教师的薪俸、校舍、孔庙的建设维修、学校食堂的供应制度等均成为国家财政体制所统筹运度的因素。第

四，私学纳入国家教育体制的轨道。汉代的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矛盾斗争，也表现为官学和私学的矛盾斗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的衰落、教育制度与取士制度的不统一以及家学的发达，官私学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解决。唐代统治者采用了两种方法解决了这一长达千年的矛盾。其一，颁定官方教材，统一教育内容，官私学生都必须按照国家颁定的统一教材进行学习。其二，大力推行科举制，使科举考试成为官私学生入仕的共同途径。我们从《登科记考》和唐代有关的金石墓志中发现，盛唐以后科举及第者大多数为私学乡贡，说明私学在唐代纳入了国家教育的轨道，与官学一道成为国家教育体制的支柱。以往的研究，很少言及唐代的私学。本文根据散见在各种史籍中的零散材料，勾勒出唐代私学教育体制的类型及其特点。第五，养士与取士相结合的选举制度。养士属教育范畴，取士是用人的政治之道。自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科取士以来，书生士子不论门第高下皆可凭自己的才学博取入仕资格。但是，科举制成为国家主要取士制度是在唐代，其成熟和健全的主要标志就是与教育制度紧密地结合，解决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养士与取士不统一的这一巨大矛盾。开元二十四年，李权事件引发了教育体制上的大改革，科举管理权由吏部移到礼部，使礼部作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对教育和科举既统一管理，又双向调节，实现了培养目标和考察方式的统一与结合。从内容上分析，科举制所设立的科目就是教育的内容，考试的方式方法也有着一致性。从唐代宰相和侍郎的入仕身份上分析，唐代前中后三个时期，由科举入仕者的比例是递进的趋势，而且所占比例也愈来愈大，说明随着国家养士与取士的统一，教育与科举的关系日愈紧密，中晚唐时，科举入仕已成为士人从政的最主要的途径。

本文的着眼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以往对唐代教育的研

究，多从制度上出发，说明唐代教育的繁荣。然而，任何一个王朝或国家的教育，首先表现出的是它的体制，制度只是体制的具体体现。因此，本文试从教育体制上考察唐代教育的状况，阐述其教育体制的基本结构，力求说明唐代教育体制是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

第二，教育体制的建立，必然有思想上的指导。本文提出崇圣尊儒教育思想是唐代教育体制建立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对唐代各项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管理的分析考察来说明崇圣尊儒教育思想的贯彻实施及对教育体制的指导作用。同时，本文认为，崇圣尊儒的教育思想是唐代的国家教育思想，在国家教育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而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个人教育思想的分析，放大了其功能和效果，这与本文的着眼点有很大的区别。

在方法论上，本文除使用传统的理论分析和史实考辨外，还尝试使用了比较分析法、计量史学、教育统计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方法，突出了量化分析。例如，在比较分析方法上，本文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教师的品秩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唐代教师政治地位高于前代的结论。在对教育内容和科举考试内容的对比分析中，得出二者在内容上的一致性，说明了教育与科举的结合。在计量史学方法上，本文对唐代教师的薪俸、学校日供公粮数、家学教育情况做了统计分析，得出教育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和士大夫家庭中女性文化水准亦较高的结论。在教育统计学方法上，本文对唐代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宰相和侍郎的入仕途径做了差异显著性情况的统计分析，得出唐代高级官员多由科举入仕的结论，说明唐代将养士教育与取士制度相统一后，教育与科举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在人文地理学方法上，本文对唐代史籍中所见明经、进士的籍贯乡里进行了考证统计，得出中唐以前唐代教育重心在北方地区，晚唐以后，教育重心开始南移的结论。

对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研究，目前仍有待于深入和发展。就唐代教育体制而言，本文也只是略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论述较浅，分析不精，问题和缺陷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宋大川

1997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崇圣尊儒的教育指导思想	(1)
一、崇圣尊儒教育思想确立的背景及原因	(1)
1. 儒学教育的内部分歧,削弱了儒学的权威性	(5)
2. 东汉时期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对儒学教育的震撼	(10)
3. 魏晋玄学的泛滥,对儒学教育的冲击	(13)
4. 佛教传播,对儒学教育的挑战	(16)
二、建立崇圣尊儒教育思想的三大措施	(20)
1. 尊崇孔子,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	(20)
2. 统一教育内容,建立唐代新儒学	(26)
3. 强化“道统”,发展崇圣尊儒的教育思想	(36)
三、崇圣尊儒教育思想的特点和意义	(41)
第二章 政教合一教育体制的健全与完善	(49)
一、礼部的教育管理体制及其职能	(50)
1. 礼部的教育管理体制	(50)

2. 礼部的教育管理职能及特点	(56)
二、中央和地方两级教育体制的确立	(59)
1. 中央官学教育体制的发展与形成	(59)
2. 地方官学教育体制的形成	(68)
3. 地方教育行政	(70)
4. 地方长官恢宏教育的政治职责	(73)
5. 地方官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	(74)
三、经学、实科、职业三大教育系统的形成	(76)
1. 经学教育	(77)
2. 实科教育	(85)
3. 职业教育	(88)
四、官学、私学教育体制的协调和统一	(91)
第三章 官学的内部管理及其特点	(93)
一、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	(93)
1. 强化崇圣尊儒教育思想的学礼	(93)
2. 强化封建等级观的入学制度	(98)
3. 严肃学规校纪的处罚制度	(105)
4. 调整身心健康的休假制度	(107)
二、崇圣尊儒的教学体制	(109)
1. 课程设置	(109)
2. 教材选择	(119)
3. 教学方法	(129)
4. 考试制度	(133)
三、教育经费的来源及使用	(134)

1. 唐代财政与唐代教育	(134)
2. 唐代教育经费的来源	(140)
3. 唐代教育经费支出的类别	(146)
四、官方教育体制的特点	(165)
第四章 私学教育的类型及其特点	(168)
一、隐居读书	(169)
1. 隐居读书的类型	(169)
2. 隐居读书的特殊表现形式	(174)
3. 隐居读书的特点影响和作用	(176)
二、私人讲学	(180)
三、私塾	(187)
四、家学	(189)
五、佛寺中的儒学教育	(197)
六、唐代私学教育体制的特点	(204)
第五章 养士与取士相结合的选举制度	(206)
一、进士、明经社会地位的升降与唐代教育内容的变化	(207)
二、教育内容与科举内容的同一性	(213)
三、从宰相、侍郎的科第看教育与科举相结合的演变	(220)
四、明经、进士的地理分布与唐代教育的重心区域	(231)
结语	(254)

第一章

崇圣尊儒的教育指导思想

西汉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思想。作为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李唐王朝在教育上确立了崇圣尊儒的指导思想。从唐初到盛唐，在崇圣尊儒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李唐王朝健全和完善了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统一了教育内容，完成了古代“养士”与“取士”之道合二为一的理想。从而使唐代教育鼎盛繁荣，威播海外，其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为以后的封建王朝奠定了稽式和楷模，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崇圣尊儒教育思想 建立的背景及原因

李唐王朝建立封建大一统的帝国后，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教育上均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为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政治上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作指导。由于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的政治化，儒学已成为魏晋南北朝各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思想。因此，李唐王朝同样选择了儒学作为治国治民的政治指导思想。

然而，贞观君臣对儒学的认识却超过了唐以前的封建帝王，将儒学视为维护其统治的最好思想武器。贞观君臣在两个方面对儒

学作为国家最有效的政治统治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

第一，唐太宗认为，儒学是政治之本，是行三代之教的有效手段。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①。在唐太宗看来，尧、舜、禹所行的是仁义之道，周公创立、孔子所传的是礼乐之教化，二者是君临天下、治国治民的最有效的思想武器。有了儒学，就如同鸟有了翅膀，鱼游于水中，就可以治国理民。反之，如果失去了儒学这一政治思想，国家就无法治理，政治上就陷于死地。因而他十分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性，认为就连暂时性地失去都不行，必须时刻在思想上予以高度重视。魏征则进一步说明儒家学说可以致太平、兴国家，建立像古代圣人时那样美好的理想社会：“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逢、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②。在魏征看来，儒家学说是达到古代圣人时代美好社会的最好方法。用儒家的“孝”教育人民，就可以产生出曾参和子骞这样笃于孝行的人；用儒家的“忠”教育人民，就会出现像龙逢和比干这样的忠臣；用儒家的“信”教育人民，就可以有像尾生和展禽这样的信义之士；用儒家的“廉”教育人民，就会出现像伯夷和叔齐这样保持名节的廉正之士，天下就会大治，尧、舜、禹那样的美好社会就能实现。封德彝也说：“三代以后，人渐浇讹，

^① 《贞观政要》6《慎所好》。

^② 《贞观政要》3《择官》。

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①”既然秦代用法治国，汉代杂用王霸之术都没能实现教化，恢复“三代”之政，那么，什么思想和学说才能担当此大任呢？唐太宗的回答是儒学。贞观三年他在诏书中说：“百行之本，要道惟先，一言终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长，宽裕之令行焉；齐礼道德，耻格之义斯具。……朕闻《书》曰：‘至诚动神’，况于百辟乎，况乎兆庶乎？比闻远近黔黎，耻为盗贼，州县图圉，多并空虚。岂繇德教至此，自是人知厌乱，因其迁善，可以化之^②。”由此可见，唐太宗及其大臣对儒家学说的政治作用看得十分清楚，认为儒学是可以教化民众、维护伦理、治理国家的最好的思想手段，因而在政治上必须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第二，总结历史上各王朝的政治教训，认为儒学才是治世之策和根本大法。魏征曾提出过一个尖锐的问题：“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诈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③这个问题始终是贞观君臣引以警惕的。给事中张玄素总结了秦代灭亡的教训，他说：“秦始皇之为君，藉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将貽之万叶，及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神祇不可以亲恃。”^④前引封德彝言，亦将秦代的灭亡归之于任法律而毁儒学。那么，隋朝“统一寰宇，甲兵疆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

① 《贞观政要》1《君道》。

② 《唐大诏令集·赐孝义高年粟帛诏》。

③ 《贞观政要》1《君道》。

④ 《贞观政要》2《纳谏》。

他人之有，”^①其原因又是什么呢？魏征总结为：“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馋邪者必受其祸，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②在贞观君臣看来，汉代政治是成功的范例，汉代的繁荣强盛与其大行儒家之道，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民的政治指导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黄门侍郎王圭曾就此对太宗说：“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③王圭的话有三层意思：其一，汉代政治清明、国富民强，是由于采用了儒家学说为政治指导思想。其二，汉代的大臣皆受过儒家教育的培养，其宰相皆通儒经，国家的政策、法规、制度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其三，魏晋南北朝（近代）时期，儒学衰落，社会风气重武轻儒，有的封建王朝甚至摈弃儒学而采用秦代籍以立国的法律之术。由于“近代”不重视儒学，从而使社会风气颓坏，政治腐败。从而引申出只有尊崇儒学才能治国化民的深层涵义。

唐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政治作用形成了共识，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方针。我们看到，自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后，儒学的研究得到深化和加强，众多的师法和林立的家法丰富了儒家思想。然而，莫衷一是的众家（儒学内部派别）之言却在政治上削弱了儒家的权威性。同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① 《贞观政要》1《君道》。

② 《贞观政要》1《君道》。

③ 《贞观政要》1《政体》。

的斗争分散了儒家思想的整体性。东汉末年王充、王符等社会批判思潮的出现，从内部削弱了儒家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和佛学的兴起，对正统地位的儒学思想亦是巨大的冲击。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冲击，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发生动摇而陷入困境之中。

唐朝建立统一的帝国后，亟须以完整的、统一的儒家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制，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然而，儒学的困境无法给新兴的唐政权以所需的帮助，儒学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统一儒家思想，改革儒学教育，提高儒学的权威性，便成为唐初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儒学教育的内部分歧削弱了儒学的权威性

刘邦建立汉朝后，在政治思想上没有成功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在这种历史契机下，先秦诸子的学说又复兴起来。汉初实行黄老政治，儒学长期处于次要的地位，一些儒家政治人物和学者作了大量历史文献研究和理论准备工作。在整理、传授、解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吸收诸子百家思想，改造先秦儒学体系，使之适应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

经过汉初“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治后，汉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然而，消极守成与积极进取的矛盾日显突出。此时，寻求一种更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政治思想的重任摆在了汉武帝的面前。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极敢谏之士，亲自向百余名对策者提问古今治国之道。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思想，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作为政治统治思想。同时，丞相卫绾奏请将治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学说的贤良悉行罢归，以免“乱国政”。这次贤良对策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思想和儒学教育成为国家教育